

解码古蜀文明 | 三星堆-金沙遗址科普专题报道 |

『独步天下』的古蜀黄金
揭示三星堆-金沙遗址制金技术传承有序

商周大金面具。图据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

片状金器大都遵循相同制作工艺

按照功能的不同,这些金器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:绝大多数都作装饰之用,例如金面罩、鸟形金饰、金箔片等;另一类为独立个体,例如鱼形金饰。

鲁海子介绍,三星堆的金器多为片材再加工而成,通常被认为遵循了同一套工艺流程,包括熔料、铸料、制片、裁切等步骤。工匠会按照器物的用途,再进行更为细致的加工,例如刻纹、打孔、包镶等,最终制成用于穿坠的圆片饰、用于悬挂的鱼形金饰,又或者是嵌于青铜头像上的金面罩等。

而三星堆这些金器具体的装饰对象,由于缺乏直接证据,暂无定论。研究人员推测相对完整、完全呈平面状的金饰可能贴附于平面化的有机质上,例如木箱。大量带有包边的残断金饰可能嵌于青铜器的纹饰中。

出土于三星堆遗址5号坑的半张黄金面具,重达280克,商周时期无出其右者。无论是尺寸还是面部的细节特征,都与青铜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,研究人员认为,除了单独作面具使用以外,不排除套嵌在青铜面具上的可能。



金杖。图据三星堆博物馆

三星堆、金沙遗址制金核心工艺高度相似

无独有偶,在成都金沙遗址,同样出土了规模较大的薄片状黄金制品。令人瞩目的金沙黄金面具,鼻子高挺,双眼镂空约呈菱形,耳垂穿孔,造型风格与三星堆金面具颇为相似。除金面具外,金沙遗址亦发现鱼形饰、圆片饰等三星堆同款金器。

除了器型相似,二者的联系还体现在纹饰上。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上的箭、鸟、鱼等组图,与三星堆金杖上的鸟、鱼、箭纹如出一辙。

然而,金沙遗址发现的太阳神鸟金箔饰、蛙形金箔、喇叭形金器等,都是三星堆遗址未有的造型。此外,三星堆遗址的多种鸟形金饰、三叉形金饰又是金沙遗址所没有的。“从器型、纹饰、功能等方面看,二者表现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。”鲁海子说。

“从制作技术上看,两处遗址金器的核心技术是高度相似的,加工流程也应基本一致,最直接的例

子是即便跨越数百年,两处遗址金器的成分表现出极高的稳定性。”这些信息足以证明两地匠人的紧密关系,“我们总结其为‘核心技术传承有序,工匠族群组织严密’。”鲁海子说。

如此大量的黄金来自哪些地方?来自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的研究人员正在推动金料溯源研究。初步研究结果显示,三星堆的黄金应来自比较稳定的自然砂金矿。

“若将视野扩展至整个商周时期的中华大地,三星堆所占据的‘中转站’位置,本应有利于黄金资源的流通与交流。”鲁海子说,“然而,如此庞大数量的黄金制品仅在这一地区被发现,这凸显了黄金在三星堆文化中的特殊地位。”

三星堆人如何获取到这些黄金资源?应该怎样深入解读黄金对于三星堆人的意义?未来,这些都是三星堆金器的重要研究方向。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

66

早在1986年三星堆1号、2号祭祀坑的发掘中,就有10件较为完整的青铜尊出土。而在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的发掘工作中,3号、4号和8号祭祀坑,又陆续出土了青铜尊,以及顶尊跪坐人像这类带有尊或是尊形器的器物。

都是青铜尊
三星堆与中原地区有何区别?

青铜尊,在中原礼器中是威严与权力的代表器物之一,大多在祭祀以及宴请重要宾客时才使用。而三星堆青铜器中的“顶尊”造型,则多了一些生动的表达,仿佛能够让人看到数千年前的祭祀礼仪场景。既然都是尊,三星堆与中原地区的尊有什么区别?

从器物的整体造型上来说,三星堆与中原早期的青铜尊是相似的,只是在细节上有一定的差别,但从尊的使用途径和在祭祀活动中的作用来看,可以说是大有不同。

“三段式折肩尊是中原早期的青铜尊造型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这种青铜尊的造型非常接近。”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、三星堆研究院学术院长孙华介绍。早期青铜尊在尊的颈部、腹部、足部有着明显的分界,其颈部与腹部中间有折肩造型设计,因而称之为“三段式折肩尊”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与三段式折肩尊还是有着细节上的不同,如器型更显瘦高、圈足也更高瘦且略微外鼓、尊口略呈盘口等。

在中原地区,尊既是对称几何造型铜酒器的统称,又专指大口深腹造型的这类青铜器。在甲骨文中,“尊”便是两只手捧着一个大口深腹容器的形象,以体现庄重、礼敬的意味。但是在三星堆,“尊更像是占据了核心地位的器型”。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器型,三星堆人开始了自己的创作。他们创造出了中原没有的“人顶尊”造型,例如出土于3号坑的顶尊跪坐人像;他们还将神像与尊结合,又如8号坑的青铜鸟足曲身顶尊神像。“不同于鼎,三星堆人选择了尊作为与神明沟通的关键器物。”孙华说。

在中原地区,尊、鬯(lǐ)等器物既是祭祀时的用品,也可以作为宴请重要宾客时的酒器组合使用。而在三星堆人

的心中,尊似乎更多担负着与祭祀对象联系的“重任”。“三星堆人在尊这种器型中,加入了场景性的表达,并且在不同的祭祀场景中都有所体现。”这一“场景性”的表达,也是三星堆文化的特点之一。

然而到了与三星堆遗址一脉相承的金沙遗址,核心的器型又发生了变化。青铜尊的重要性逐渐消减,鬯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。在十二桥文化竹瓦街遗址的器物坑中,曾出土了两组列鬯组合,分别为5件一组、4件两组,体现了典型的“列器”制度。孙华介绍,这种以鬯作为核心的传统一直影响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。在新都马家战国大墓中,就曾出土过一枚印有二人抬鬯图形的巴蜀符号印章。墓中大量的青铜器,其中就有5件一组的铜列鬯,昭示了墓主人不凡的地位。

至于为何会产生“从尊到鬯”的变化,孙华推测,应当是古蜀先民在献酒的方式上发生了改变:“无论是祭祀活动还是宴请宾客,都省去了将酒从鬯倒入尊的过程,因此产生了这样的变化。”

华西都市报-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



三星堆出土顶尊跪坐人像。图据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